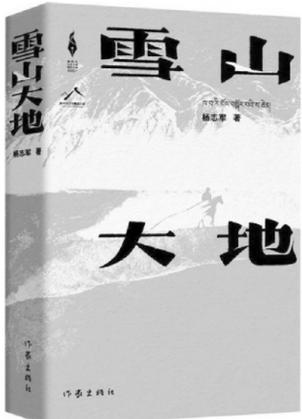


一部雪域高原建设者的精神史

——评长篇小说《雪山大地》

施展



青藏高原是杨志军的血脉故乡和精神宿地。数十年间，他孜孜不倦地开掘青藏高原的文学故事，描绘这里的

历史风采和审美情致，使之自成一片小说天地。这份守望与坚持，实在令人敬重。

他的长篇小说《雪山大地》(作家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)，入选中国作协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和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。小说以父亲20世纪50年代深入沁多草原、调查牧民生活为主线，情节几乎贯穿了雪域高原上生产、教育、商业、医疗、环保等一系列内容，巨细靡遗地记载了诸多具有划时代

意义的历史事件，在描摹雪域高原沧桑巨变的同时，全景式展现了一部边疆地区的发展史、一部牧民生活的变迁史、一部雪域高原建设者的精神史。

小说中，父亲偶然结识了角巴德吉、桑杰等藏族牧民，他们身上具有藏族人特有的康健与洒脱，性格热情却有些执拗，为人善良而不失智慧。此后，三人骑马穿梭在大草原，携手踏上了建设草原的漫长征程。父亲为报答桑杰妻子的救命之恩，将她患聋哑病的儿子才让接到市里治疗，让新一代草原儿女们健康成长起来。种种因缘际会下，“我们家”成为一个汉藏交融、上下三代的大家庭，彼此间凝聚了情同手足、骨肉相连的情谊。

作为第一代草原建设者，“我”的父母是“难得消停的人”。数十年来，父亲做过科长、校长、牧民、经理、副州长，团结众人办学校、建医院、盖房子、开公司、修公路、迁新城；母亲从市医院主动来到资源匮乏的县医疗所，再深入麻风病人聚居的生死隔离山，用医者仁心拯救了无数病患。回首父辈的人生之路，他们的生活是筚路蓝缕的无怨无悔，不图名利的诚意诚心。近半个世纪的光阴中，时代的巨变、命运的遭际，足证改革之路的艰辛和曲折。然而，父母的选择，将人生意义与家国理想、道德责任和理想激情紧密相连，展现了先行者群体的伟大品质。在父辈感召下，“我”、才让、

江洋、梅朵等一代新人经历了“激情燃烧的成长岁月”，自觉成为理想主义的继承者。可以说，这代人的历史贡献，不仅满足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迫切需要，更为草原人民的幸福生活绘制了蓝图远景。

直面时代风云的急速变幻，杨志军力避宏大叙事的空洞，调动起数十年间的生命体验，扎根在牧民家庭生活样貌与思想观念的真实变迁，以扎实缜密的生活细节，出虚入实的诗意笔墨，刻画了雪域高原的牧场风光、藏地文化的民族风情。纵然时代巨变贯穿全书，但人性世界的交集体现于生命情感的领域。身居天寒地冻的雪原荒野，人们更需要心灵抚慰和精神滋养。正所谓“羊铜牛银马黄金”，骏马和藏獒是牧民的忠诚伙伴，歌声与舞蹈是心灵的永恒财富。小说里首部颂歌中的一声声“扎西德勒”，可谓诉尽了作者对灵魂故乡的深情礼赞。

《雪山大地》是深具理想气质、充沛浩然之气的写作。作者沿现实主义创作道路，立足于文学的人文立场，延续着关怀生命的文学传统。对“人”与“自然”的关心，始终是他持续写作的内在动力。正如全书关于牧民生活、生态保护、和谐发展等现实命题的反复辩证，饱含深情的忧患意识，蕴含了一位作家对生命的守望，对真和美、信与爱的持守。综观全书的艺术品质，其文学叙事

和山乡巨变的时代图景相接轨，人物命运同家国天下的发展历程共始终的创作题旨，以及字里行间激情乐观的温情叙述、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，不难让人联想起社会主义经典文学的艺术光芒。这不但在杨志军藏地写作中具有标志性意义，更是对新时代文学的价值立场及风格质地，给予了全新的发现、肯定和诠释。

面对草原建设者的精神遗产，《雪山大地》诚为其树碑立传。虽然一代人的身影已然远去，“但远去的不是必然会消失的，我们能看得见，无论有多远，无论在哪里，我们都能看得见”。沁多城、阿尼玛卿草原、丹玛久尼自然保护区……数代建设者的功绩，一如雪山大地上迎风飞扬的洁白哈达，又如漫山遍野的空气、雨露与种子，终将播撒在每一位后继者的心田。

小说结尾，正当一切故事在“我”的记述中圆满落幕时，未完结的故事却向了通往未来的开放状态。这条崇高庄严的精神天路，写满了一代人的跋涉履迹和心路历程，前行者的身影犹如雪山大地一般雄壮灿烂、永驻人心。作为见证人和记录者的杨志军，必将继续行走在神圣、素洁的旷天大野，与千万万同胞共沐雪山之光，持续讲述着大草原上曲折不尽的故事。他依然在海拔最高的大地，在爱与生命的制高点，努力攀登“人”的文学高峰。

寻求真相的勇气

——读夏榆长篇小说《我的独立消失在雾中》

孙 鹏



因我就职于煤炭行业，对于煤矿题材的小说或者煤矿出身的作家格外关注，天然就多几分亲近感。比如作家夏榆，从小生长在大同矿区，用他的话说，他家距离云冈石窟不足两里地，小时候经常到石窟，爬到石洞顶上掏鸟蛋。长大后他在当地煤矿招工，成为一名所谓“前工业时代”的矿工。后来他跑到京城闯荡，在某知名报刊担任记者，再后来他成为一名职业作家。

我之所以多说几句夏榆的人生经历，不为别的，就想为鉴赏他的文学作品作铺垫。因为从他的小说中，我能读出一个经历多重生活磨难者的坦然和坚毅，一个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，一个具有善良敏感、同情弱者、悲天悯人作家的处世情怀。

读完夏榆长篇小说《我的独立消失在雾中》，心情久久不能平息，如同“良知”被作者掏出来放在干冷的空气中晾晒一般。本来读小说是一件轻松的事情，我却读得如此之累。这么说来，我真要感谢作者，是作者通过文学创作引导启发激励像我这样的

读者产生出反思生活、反思社会、反思人类的高尚境界和历史责任感，这何尝不是文学的价值呢？

这部小说的节奏感、代入感、画面感很强，让读者在不同时空、不同事件、不同情感中来回穿梭，如同看电影一般。小说文字很干净，善于用短句，偶尔露锋芒，犀利的语言像辣椒水一样直接喷洒读者灵魂痛处。看得出，作者不愧为记者出身，文字拿捏功夫非同一般；同时也看得出，作者试图在作品中寻求真相，这恐怕也是记者在文学创作中被职业精神所驱使的无为之。我想，这种探究真相的写作方式，会让读者有一定的压迫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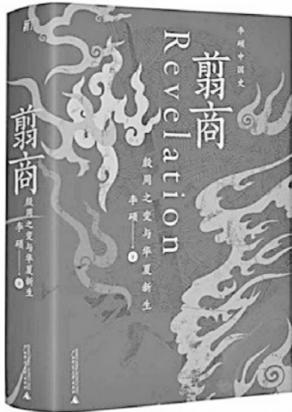
我不由想到上世纪有个叫凯文·卡特的摄影记者，在苏丹大饥荒的时候，他曾拍过一张照片，前面是一个骨瘦嶙峋、奄奄一息的黑人孩子，后面站着一只目光凶恶、跃跃欲试的秃鹫。这张照片让他扬名天下，并获得了普利策新闻摄影大奖。但不幸的是，获奖不久后他突然自杀身亡，他在遗言中说：“真的，真的对不起大家，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。”

《我的独立消失在雾中》的主人公陆游，就是一位类似凯文·卡特的职业精神很强的记者。我理解的所谓职业精神强，就是他始终坚持用自己独立的思想去判断、认识事件，竭尽全力把事件最真实的状态呈现出来。“我不惜一切代价追寻生活真相的人。这注定了我受苦，注定了我在活着的时候饱经磨难。”陆游在经历百般磨难后，无奈地发出以上感慨。小说最终，他也为寻求真相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

也许有人会问，生活中的“真相”难道有这么重要吗？不知道所谓的“真相”，人们依然能够快乐地生活吗？过去我可能还会争辩几句，但读完《我的独立消失在雾中》后，我竟无言以对。

追忆华夏文明的曦光

甘武进



人物(周文王、商纣王等)以血肉，使我们对于华夏文明的起源有了全新的认知。

从新石器时代以来，华北地区形成了杀人献祭的原始宗教。第一王朝夏朝也沿袭了这种人祭文化，并在随后的商朝登峰造极。“商王需要直接管理的王朝事务比较少，其最重要的事

务是组织祭祀和战争，而商人各宗族则承担提供祭祀供品和战争动员(自带装备)的任务。”对商人来说，在聚会典礼时杀戮异族，不仅仅是给诸神奉献献祭礼，也是让围观者获得精神刺激和满足的“盛宴”，比如当人数数量不足，献祭者还会尽量延缓人性的死亡，任凭被剥去肢体的人性尽量地挣扎、哀号或咒骂。“这种心态，和观看古罗马的角斗士表演有相似之处。”

武王死后，由周公辅政，彻底禁绝了人祭宗教，销毁了有关商人祭的文书记录，并制造出一套没有人祭的理想化历史叙事，以及基于“德”的世俗政治与道德体系。一是拆分商人族群，消灭其军事实力和人祭宗教；二是分封各种诸侯国，统治、同化新征服的东方地区。在周公辅政最后一年，周公旦以王的身份宣传册封弟弟周封为卫侯的决定。他要求周封管理好殷商旧民，还要让他们改变陋习，成为新民；在统治方式上，则要求周封必须垄断刑罚的权力。对新征服的东方地区，实行文化上的改造，铲除商人血祭宗教的遗留，使其彻底同化于周人的文明。

随着跨族婚姻与民族融合，新兴的周文化出现了，它是西周族传统

文化和商文化的融合；它继承了商人的文字体系，但部分语言习惯来自周族；它继承了商人的“上帝”观念，但又逐渐将其淡化为含义模糊的“天”；它严厉禁止商人的人祭宗教，拉远人和神界的距离，拒绝诸神直接干预人间事务。周人谨慎，谦恭，重集体，富于忧患意识，这些都成了新华夏族的样板品格。周公的这些举措，开创了新的华夏文明。五百年后，孔子编辑儒家“六经”，系统整理周公的理论成果。周公和孔子塑造了儒家学派，其影响一直持续到现代。

在传统的上古历史叙述中，商周时代的面目是模糊的。关于背后的细节，我们知之甚少。事实上，一部好的历史著作，不仅要有数学家的逻辑，还要有文学家的想象。作者在此书的撰写中宏大堂堂正正，细做处绵绵实实，运用大量现代考古发掘的成果，对应甲骨卜辞及《易经》卦象，将费解的言辞重新释义，重构武王伐纣的历史认知等，为读者揭开了华夏上古历史中重要的一页。本书中李硕还提到了很多文明如青铜技术、大禹治水的真相等。翻开此书，大家可以走进幽暗的历史通道，窥见我们这群人何以如此，何以至今。它将给我们鼓励，去认识自己，直面未来。

人祭，就是杀人向鬼神献祭。关于上古的人祭风俗，直到近百年现代考古学兴起，发掘出殷商的大量人祭遗址及商王占卜献祭的甲骨刻辞，才进入现代人的视野中。至于这种风俗是如何退出历史和人们的记忆的，大多数学者似乎默认，它是逐渐、自然、不知不觉地退场的。但《翦商：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》的作者认为：人祭的消亡和周灭商有直接关系。“在周武王死后，辅政的周公旦取缔了商人的祭人祭风俗，并消除了关于人祭的文字记录和文字记忆；周公此举可能是防止死灰复燃，执行得也比较成功，于是留下了三千年的记忆空白。”

作者李硕，是青年历史学家，著有《孔子大历史》等有影响力的历史著作。此书借助考古材料和传世文献，梳理了上古人祭风俗产生、繁荣和消亡的全过程，以及人祭与华夏早期文明从伴生到分离的伟大转折，再现了古人(周人)为终结商朝和人祭风俗付出的巨大努力。具体而言，此书深入上古史，通过鲜活的叙述，深入探索商人与周人的民族起源、信仰习俗、战争军事与日常生活，将故纸堆与遗址变成了生动的情节故事，用史料赋予神话中

新书速递



《这才是丝绸之路》
作者：侯杨方

这是一本实地考察、精准复原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经典路线的历史纪行作品。作者在对历史资料解读、研究的基础上，以历时10年、超过20次、累计行程3万公里重走丝绸之路的经历，采集地理位置、路线轨迹及影像资料，精准复原历史上多条丝绸之路路线。

《成神：中国的毕加索 世界的库淑兰》

作者：许海涛

该书详细讲述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“民间工艺美术大师”称号的“剪花娘子”库淑兰的人生嬗变传奇。全书不仅展现了库淑兰的艺术发展历程，而且对她的生活细节刻画真实生动。



《银河边缘013：黑域密室》
作者：付强



“银河边缘”是一系列专为年轻群体、快节奏都市人群、科幻迷打造的科幻小读本。《黑域密室》是“银河边缘”系列第十三辑，本辑以北大物理学博士付强的作品《黑域密室》命名，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太空中的密室杀人事件。

“鸟儿是飞翔的火焰”

刘 军

中，如果说长白山尚拥有大区域的特性的话，那么，富尔河则是作家展开自然观察的具体载体，但在这个小地方上，集束了不同鸟类生存斗争的光芒。除了独特的地理单元之外，作家笔下还记录了诸多长白山独有的树木，虽然它们承担了辅助性的功能，但这些植物同样指向地域性的独特；另一方面，通过两年的观察积累，在扎实的田野经验基础上，作家已经掌握了井口深挖的规律，搭建了生态写作的纵深。

生态散文是一种知识和经验紧密结合的散文体式，经验赋予生态散文特有的笔力、个人化叙述、感染力，知识体系则赋予生态散文观念上的明确指向。利奥波德在《沙乡年鉴》序言中指出：“野生的东西在开始被摒弃之前，一直和风吹日落一样，被认为是极其平常而自然的。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：一种平静的较高的‘生活水准’，是否以值得牺牲自然的、野外的和无拘束的东西为代价。对我们这些少数人来说，能有机会看到大雁比看电视更重要，能有机会看到一只白头翁花就如同自由谈话的权利一样，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。”他的这一番话道出了一个先驱者的先见之明，在工业化、城市化急速狂飙的时代里，人和自然之间同样处于急速分离的过程中，不仅自然景观被人类进步的科学技术所改造，更重要的是，地球上几乎每个角落都在遭遇物种多元性被破坏，生物多样性的退化一方面给人类生活带来现实的危机，另一方面，



源于人与自然的加速分裂，使得人类在精神层面走向了和谐的反面。基于高度物化的现实和人们对工具理性的过度崇拜，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忧心忡忡地发出预警，他认为如此下去，人将从人退回动物，甚至蜕变成怪物。环境危机和精神危机的双重重压之下，今天的人们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，保护环境是第一步，善待动植物，生命伦理应该外扩到生物圈，这是第二步，而回到自然中去，与自然展开对话，构建主体心灵的和谐，更深刻地去理解生命，则是更高的一步。

“长白山鸟类三部曲”在体例上大致相似，每一本散文集皆由三个小辑构成，其中前言和后序皆由作家亲手制作，从中可见高维生的真实体温和

内心波动。三部曲中，除了精确的观察和记录之外，作者还代入了其他的线索。因为作家的童年就是在长白山脚下度过的，所以，诸如童年的追逐、攀登经历，朋友姐夫讲述的故事过往，山民的自叙，另有其他插入性叙述。以上这些片段在作品中承担了调整曲线的功能，如此避免了记录的平铺。就观察对象而言，有留鸟也有候鸟，这样，季节变迁下长白山的自然气息一一呈现；有天空中的猛禽，鹰隼类就有十几种，各有其习性和领地，也有树枝上栖息的体型柔弱的鸟类，这一类的记录内容居多，另有水陆两栖或者水上活动的鸟类，如中华秋沙鸭等。为了准确描摹笔下鸟类的习性和外貌特征，作家多采用地方俗语、谚语的用法，像水扎子、大头蛮子、蓝大胆、土豹子、夜猫子、小胖墩、马姑友子等，这些鸟类的名称可谓又土又形象。

谈及生态理念，《寂静的森林》中的第一个作品《老鹳子》恐怕很能说明这个问题。在富尔河畔，作家偶遇雀鹰捕杀喜鹊的行为，这个时候，哪怕是弹动树枝或者扔出一块小石头，就可以解救喜鹊的生命。然而作家最终做了旁观者，他是如此自道的：大自然的法则就是如此残酷，弱肉强食，我不能参与进去，破坏生存的食物链条。作家在此处的无所行动，与野外摄影师在非洲的境遇，动作一致，规格同一，皆表达了对自然法则的充分尊重。

“八公山”文艺评论 (第八季) 征文

我阅读《天空的流浪者》《鸟儿歌唱的地方》《寂静的森林》这三部散文集的过程中，每每会想起泰戈尔这位东方的灵慧诗人，同时也想到了海德格尔晚年在黑森林的隐居和哲学思考的转向，他的后人合一的哲学，给予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期的人们以灵性的启迪。

新世纪之初，尽管散文领域内动物题材的作品数量上越来越多，层次也更加丰富，而关于鸟类的观察和记录，规模性的涌动则是近些年生态写作成为热点之后的事情。叶梅、祖克慰、罗张琴、王族、傅菲等作家纷纷调整聚焦，将观察视角投射到鸟类群体之上。但是像高维生一样，集中于某一个地域，将留鸟和候鸟统于一体加以系统性的构建，尚属罕见。程虹教授在《寻归荒野》一书中总结了自然文学的三大特征，其中，强调地域感就是其中一个点。以此对照高维生“长白山鸟类三部曲”的话，在外在形态上，高维生的自然观察笔记或者说生态写作，就具备了两个较为突出的棱角。一方面，他笔下的鸟禽落地于长白山区，在原生性的勾勒基础上，凸显长白山鸟类的丰富与多元。这其中，富尔河的地名贯穿于三部散文集